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

王水照

卷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

主 编 李 克

学术顾问 傅璇琮

王水照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WUJUAN PUBLISHING COMPANY

© 王水照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水照卷 / 王水照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1.1
ISBN 978-7-5470-1335-9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②古典
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文集 IV. ①C53
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6806号

设计制作 /  智品书业
ZHIPIN BOOK

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王水照卷

出版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 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电话	024-23284627 23284050
电子信箱	vpc_tougao@163.com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成品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31.75
字 数	43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丁建新
书 号	ISBN 978-7-5470-1335-9
定 价	6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58572701

编纂说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瑰丽奇特的远古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出现了许多古今知名的文学家和文学巨著，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使得中国文学以其优秀的历史、多样的体裁、众多的作家、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和辉煌的成就而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因自身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一直以辉煌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

而今，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我国的社会文化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新面貌，其中，我国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各个领域均出现了誉满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他们的思想光辉夺目，他们的作品精细微妙，文采肌理具在。我们要了解当代社会学术研究发展的大趋势，要研究学术名家的学术思想，主要也应从他们的专业研究著作加以探讨。为了使读者可以仔细领会名家作品的内在精细微妙之处，细细品味每一部作品，感受他们带给我们的新领悟，我们特意编纂了此套《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并邀请原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的傅璇琮先生担任本丛书的顾问，傅先生在丛书的编纂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本文库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推出，所选作品兼具学术性与文学性，收录的是当代著名学者关于国学或传统文化的论文、随笔、专著节选等，此次出版的十种包括田余庆、戴逸、袁行霈、王尧、徐季子、乐黛

云、罗宗强、李学勤、傅璇琮、王水照诸位名家的著作。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学者呕心沥血的求索，潜心研究的成果，处处展现了当代“大家”的风范，无不是当代学术思想的精华。他们以自己卓越而深邃的人格、思想和学力，以简练优美的语言、细腻的情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独领风骚，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本文库轻松而不浅薄，深厚却不晦涩，是一项极具价值的出版工程，它不仅将带领我们领略美不胜收的文化之旅，而且能让我们更深领悟当代学术成就的精妙思想，社会意义深远，学术价值极高。愿此项凝聚众多专家和编辑心血的工作，能对中国社科文化的发展和学者思想的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

自序

承蒙傅璇琮先生雅意，邀我“加盟”这套“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感与愧并。收入本书的篇章，说不上有多少学术积累的价值，并非名山事业，却总算是个人治学道路上的坚实足痕，也是一己生命的重要构成。

我的学术道路和生活道路总的说来是较为平顺的。虽与同辈人一样，经历过反右、红专辩论、四清乃至十年空前浩劫的曲折与磨难，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也未遭受大的挫折与打击。不是阳光一片，也够不上风雨人生。回首往事，我特别庆幸能遇到三个称心如意的学习单位与工作机构：求学于北京大学五年，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十八年，任教于复旦大学三十多年。“文革”结束前的二十三年，学术成果稀少，且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拘限，乏善可陈，因而这段时期的文章，本书中一篇未收，但是，北大的系统学习是我的学术启蒙，并因参加五五级同学编写文学史之举，意外地规定了我日后专治宋代文学的方向；经过文学研究所的专业工作，使我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得到初步培养，学术规范、学术门径得到训练与开拓。但只有到了新时期来复旦任教以后，才真正进入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时期，陆续有成果问世，取得了一些成绩。这里我尤要感恩于许许多多师长和同道的教育、提携、切磋和帮助，若没有遇见他们，人生将失去色彩。

北大、文学所、复旦，三点一线，都使我与宋代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我是北大“红皮”文学史宋元文学部分的主要编写人，在文学所又

被编入古代文学组的唐宋段，尤其到复旦以后，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科研。这时，我才与过去“以任务带研究”的模式告别，能按照我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特点、禀赋素质的优劣，自由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于宋代文学，由诗词而兼及散文，从个体作家到群体作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文学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拓展，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性有所加强。但也有明显局限，即治学领域越来越集中到宋代文学上，几乎达到“目不斜视”的地步。近年来，关心的范围稍有扩大，如对中国古代文章学等，用力较多，假如主客观条件允许，准备投入更多的精力。

我在二〇〇〇年编过一部自选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十年来又续有所作，分别在不同报刊杂志上发表。本书即由新世纪前后所作的两部分文稿所编成，前期采择较严，后期选取稍宽，因文稿散见各处，辑录于一书，便于读者和自己查阅。这两部分篇幅大致相埒。略以内容厘为四辑：第一辑为总论。大抵综论宋代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努力在实证基础上追求一种贯穿性、整体性的宏观把握。第二辑为专题研究。就具体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类“问题”，提出个人见解；有两篇论及钱锺书先生的宋诗观，是我一项国家研究课题的阶段成果。第三辑为考辨诸什。以上三辑均属宋代文学范围，对全局性论题的思考，对具体专题的考论和资料性考辨，即所谓“大判断”和“小结裹”的结合，实是学术研究应守之道，也是它的内在逻辑。第四辑则为其他论题，已不限于宋代，均为近年来所作，算是新探索吧。

岁月荏苒，马齿虚长，在此时来编集子，不免带有总结的意味，但我希望不要成为“终结”。南宋赵蕃暮年命名自己的书斋为“难斋”，乃取“末路之难”之义（典出《战国策·秦策五》）。我曾感慨过，年华老去，“末路”即人生旅程之晚年不请自来。晚年之难，一言难尽，思维迟钝而新知锐增，精力不支而杂事丛脞；衰病日寻，犹白香山所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更是难逃之劫。但赵蕃却以“难斋”自警自励，期

以克服“末路之难”为暮年人生的追求，努力在文化事业上续有建树，不失为老年人的好榜样。天假以年，我将坚守一个知识人的本分，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二〇一〇年七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第一辑

- “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
——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
..... 1
- 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
——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
..... 17
- 重提“内藤命题”
——宋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建构的一种设想
..... 37
- 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 44
- 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 60
-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 82
- 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 100
- 宋代文学研究的思考
——北宋名臣文集五种出版感言
..... 142

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 151

第二辑

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 168

欧阳修所作范《碑》尹《志》被拒之因发覆····· 182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198

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 215

论苏轼的高丽观····· 233

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 250

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

——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 277

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

——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

····· 298

《宋诗选注》删落左纬之因及其他

——初读《钱锺书手稿集》

····· 313

《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 332

第三辑

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 345

记蓬左文库旧钞本《东坡先生年谱（外一种）》····· 371

记蓬左文库所藏《王荆文公诗李壁注》 （朝鲜活字本）	392
《醉翁琴趣外篇》伪作说质疑	407

第四辑

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	413
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	422
况周颐与王国维：不同的审美范式	438
作品、产品与商品 ——古代文学作品商品化的一点考察	461
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启示	477

第一辑

“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

——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

一 宋型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成熟期的型范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黄袍加身”，即位称帝，揭开了有宋三百多年的新的王朝史。赵匡胤虽是承袭了唐末五代武人篡权的故伎，却能运用强干弱枝、权力制衡、文官政府、厚禄养士等多种政治智慧，形成了一整套“祖宗家法”，使纷纷扰扰几十年的混乱分裂局面终告结束，重新建立了与秦、汉、唐相并称的统一王朝，创造了彪炳史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宋代文学也以其独具的时代特点和杰出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辉煌篇章。

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必然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条件的制约；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封闭自足的心理结构中进行创作，必然接受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文坛风气的深刻影响。在制约和影响文学发展的多种因素和条件中，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成果的文化，无疑是关系最直接、层次最深的因素。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或许是一个较佳的切入点。

在唐宋文化研究中，有所谓“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对举区界的说法。据我们有限的见闻，台湾学者傅乐成教授可能是此说的首倡者。他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①一文，从“中国本

位文化建立”的角度，论证了唐宋文化的“最大的不同点”。他说：“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这里提出的从类型上来探究唐宋文化各自特质的命题，甚为精警，尽管在内容的界定上不无可商榷之处，也仍然获得了海峡两岸学者的纷纷回应。

在我们看来，唐代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而从文化上看，唐朝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上升期，宋朝则是由中唐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的定型期、成熟期。因此，类型的划分比单纯的朝代划分，更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当今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说：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②

邓先生这一“空前绝后”的最高级评赞，曾在学术界引起过讨论，但邓先生此说并非无因，实乃秉承师说。我们不妨看看他的两位师辈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见解：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③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④

“前之汉唐”“所不逮”、“造极于赵宋”即是“空前”，“后之元明”云云也就近乎“绝后”，而邓先生认为宋朝文明还超迈清代，更是转进一层了。如果再往上追溯，则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言：

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擅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⑤

这几位古今学术大师对宋代文化的一致评价，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已达到一个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的新的质变点。对于“空前绝后”这样不免带有绝对化色彩的赞语，我们后辈学人或许可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限制和补充，但也很难达到他们的直觉表达所蕴含的对表述对象的深层把握，然则宋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成熟型的范式，应是没有疑义的。

对“宋型文化”的研究，困难之处不在于一般地确定其作为成熟型的特质，而在于揭示其区别于“唐型文化”的具体特点。在傅乐成教授用“复杂而进取”和“单纯与收敛”来分指两者各自特点以后，不少学者进一步予以发挥，促进了研究的深入，但某些看法，如认为“宋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单纯性”等，似尚可继续探讨。^⑥

二 “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

早在1922年，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对“近世”的含义，内藤氏多从政治体制上着眼，他又说：“中世和近世的文化状态，究竟有什么不同？从政治上来说，在于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⑦嗣后，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则从社会经济、城市、教育普及等方面进一步论证宋代“近世说”：“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⑧几乎在同时，严复

也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⑨他虽未用“近世”之名，但已敏锐地发现宋代与“今日”（民国初年）在社会文化形态上的种种联结点，“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指明研究宋代文化的现代意义，则最具慧眼。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第六章就把“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称为“近代早期阶段”，因为“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東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而胡适则径称从“公元一千年（北宋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为“现代阶段”或“中国文艺复兴阶段”或“中国的‘革新世纪’”^⑩，其论断更为鲜明。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流行看法，大抵从两个方面来确定“近代化”的含义：一是从社会制度的性质来界说，即封建制的解体、农耕自然经济结构的崩坏和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一是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立论，即以所谓“西学东渐”、接受西洋文化为标志。然而宋代均未达到这样的历史阶段。一般说来，中国封建制的动摇或逐渐解体，是明中叶以后才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宋代城市发展，手工业、商业繁荣，虽给上层建筑带来某些深刻而有意义的变化，但毕竟还处于初级阶段，对于宋代的政治权力结构、主要的社会思潮和文人的基本文化心理等尚无明显的重要影响，“西学东渐”更未提到历史日程。那么，怎样来理解上述诸家之说呢？我们不妨从宋代的“祖宗家法”^⑪即治国纲纪、安邦法度入手，具体考察一下其政治结构、社会思潮、文化心理等特点，看看是否包含一些指向“近代”的新因素。

众所周知，有宋一代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代。正如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⑫皇权得到空前的加强。然而，赵宋王朝的权力结构又是以广大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典型的文官政府。有两

个数字很值得注意：一是科举取士。据统计，北宋一代开科 69 次，共取正奏名进士 19281 人，诸科 16331 人，合计 35612 人，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约为 61000 人，平均每年约为 360 人。^⑬这不仅与唐代每次取士二三十人相比数差悬殊，而且也为元明清所不及，真可谓“空前绝后”。宋代又增设封弥、糊名、誊录等制度，尽可能地实现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提高了封建政权的开放性。尤可注意的是大批“孤寒”之士进入官吏行列，宋太祖曾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⑭唐太宗在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也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⑮的话，反映出对科举制开始取代魏晋以来九品官人法这一历史进步的喜悦。而实际上唐代的取士权并未完全从“势家”大族手中收回，就政权的开放程度而言，亦不及宋代。二是布衣入仕的人数比例。据统计，在《宋史》有传的北宋 166 年间的 1533 人中，以布衣入仕者占 55.12%，比例甚高；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 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 64.44%。^⑯另从最高的宰辅大臣的成分来看，唐代虽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作了很大的冲击，但世族仍保持相当的政治势力，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 23 人任相，占全部唐代宰相 369 人的十五分之一。而宋代宰辅中，除了吕夷简、韩琦等少数家族多产相才者外，非名公巨卿子弟占了很大的比重，布衣出身者竟达 53.3%，像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名相，均出于寒素或低级品官之家，但他们却成为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

赵宋王朝的权力结构引进了多种平衡机制。首先是相权对皇权的牵制。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涉的建制，对相权予以限制和分割，皇权从制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例如在一般情况下，重要官员的任命权统归皇帝，“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圣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⑰。然而，宋代的政治发展史表明，此一“祖宗家法”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实现，皇帝在多种场合下不得不听命于掌握实际权力的宰执大臣的意志，这在三百年间的朝

廷舞台上可以找到明确的例证。^⑧其次是台谏对相权的抑阻。北宋之前，谏院并非独立职司，谏官原是宰相衙门的属官，其监督的对象是皇帝；宋仁宗时，谏院成为独立机关，谏官由皇帝亲自除授，监督的对象转以宰执、百官为主，职权范围大大扩大；同时又有谏官“风闻言事”的特许，鼓励“异论相搅”，这也成为专制政权中一种有力的自我牵制，助长了政治上自由议论的风气。宋代御史台的御史职能，也逐渐与谏院的谏官混同，形成台谏合一之势。苏轼对此领悟尤深，他在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⑨中把此作为“朝廷纪纲”。他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又说：“陛下（宋神宗）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苏轼此论深中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关键，故常为后人引以为据，如南宋楼钥在《缴林大中辞免权吏部侍郎除直宝文阁与郡》^⑩中为曾任言官的林大中辩护，即引苏轼此大段言论，说明这一制度一直施行到南宋。

宋代上层政治中的党争，尤其是围绕庆历、熙宁变法而展开的新旧两党之争，也具有近代政党竞争或斗争的萌芽性质。绵延近四十年的唐代牛李党争，恩怨源自私门，是非出于意气，说不上有什么政治主张的实质性分歧，因而只能成为瓦解封建政治秩序的破坏性因素。北宋前期的党争双方，其主要领袖人物大都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忠实信徒，只为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的实现，而互不相让、争斗不止。吕夷简为宰相时，范仲淹进《百官图》以弹劾吕氏，指斥他升黜官吏之不当；但后来吕氏竟为范氏出谋献计：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过郑州时，退居的吕氏提醒他说：“君此行正蹈危机，岂复再入？若欲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为便。”一语竟使范氏“愕然”。果然，在朝的范氏政敌趁他赴边之际加紧攻击，促使“帝心不能无疑矣”^⑪。他俩顿释前憾、化敌为友